

访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媒与文化经济专业贾斯汀·奥康纳(Justin O'Connor)教授:

文化生产不能只对有利可图的消费需求负责

采访/任明

文汇报:从2014年起,每年暑假您都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学生来上海与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合作举办文化经济暑期班。在您对中国问题的长期观察中,以及您就此谈到的不少观点,都聚焦在中国及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回顾我们近年来的数次会面,尤其是前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文化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与您的交流,我感觉您对中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可以请您详细谈谈您对中国特别关注的是出于何种缘由吗?

奥康纳:我个人的感觉是,近年来,全球政治地理形势有很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与以往很不一样了。这一点不仅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世界来说是如此,对全球各种政治力量来说,都是如此。

过去几年来,我认为全球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值得关注

的发展倾向。首先,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具有必然的共识——这一点即使是对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理论的支持者来说,也是如此。第二,自冷战结束以来,所谓“现代”,往往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着等号,多年未改变,但是眼下,“现代化”已经不再为西方所独有。第三,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未来越来越不具有可行性了,因为“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在西方都归精英阶层所享有,这一制度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第四,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与人口增长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导致了大规模的生态受损、资源消耗及气候变化,而全世界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第五,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几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对“民族国家”产生影响,也对冷战结束

以来的世界政治地理秩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我认为这些趋势所带来的改变对中国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中国所寻求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自19世纪晚期以来,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作斗争的过程中,一直都有自身的奋斗目标,1949年新中国以来,中国也一直秉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价值传统。上面所提到的全球几大发展态势,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就头两项发展态势而言,西方的现代化遇到极大挑战,这为中国在如何定义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掌握自身话语权的机会。这不再是一个机械的、有关中国如何模仿赶超西方的问题,而是有关如何寻找并定义中国自己的发展轨迹的问题——中国应该寻

贾斯汀·奥康纳: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媒与文化经济专业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访问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成员之一,支持并参与2005年《保护与提升文化多样性公约》相关工作,曾负责撰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创意产业政策文件。他于2016年出版的学术论文《创意产业之后——兼论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经济》,对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兴起及其与文化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较为透彻的描述。奥康纳教授与顾鑫合著的新书《新上海的文化产业》将由Routledge出版,该书以中国改革开放为背景,以上海为棱镜,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中国文化创意领域的发展,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中国现代性发展轨迹的宏观视角之中。

求的是一种与西方相比更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现代性”。对此我要说,中国当然应该坚持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所谓“现代”,并不必然就是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样子。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性及生态毁坏、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是监管不足的市场发展所

解决不了的问题。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都会面临环境破坏的问题,如何以一种“保护社会正义”的方式去努力解决生态破坏的后果,这一点也是中国在现有制度下不断尝试的。最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下转13版) →

← (上接11版)

题:宋育仁以为包括埃及在内的西方文字源自中国,“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而文廷式转述的爱李尔,则相信“埃及与中国古文实为同源”。

关于此问题,郭嵩焘在伦敦时日记亦有云:

曩见格兰斯敦,知其多通希腊之学,因举埃及文叩之。格兰斯敦谓英国精通埃及学者二人:其一百尔治;其一戈谛生,现充上海按察司,亦因中国古篆多与埃及同,欲因以考求中国文字源流,因假一官以为久驻中国之计。闻其人近今物故,屢道上海,未及一访之。(《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3页)

他返国时途经香港,又记香港总督亨得利的谈话:

……自云与威妥玛皆爱尔兰人,近年爱尔兰有掘地得小玉印数方,皆中国篆文,数千年前实与中国同文。予谓伦敦曾见之,疑中国此种小方印,宋元以来书画家用为引章,其传不过数百年,恐尚为中国物也。亨得利曰:“不然。中国文教最先,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

也。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其言亦附会近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63-964页)足见这类看法绝非孤立之见。

早在16、17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卫匡国,就已注意到汉字与埃及文字在表面上的类似(参吴荊第《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212页)。直到18世纪,或以为汉字源于埃及,或以为埃及文字源于中国,仍是较常见的看法(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65页);正因这一背景,就连最终破解了埃及古文字的商博良,早期为考察汉字与埃及文字的关系,也曾涉猎过汉字(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71页)。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板津七三郎仍有《埃汉文字同源论》之作,相信汉字源于埃及圣书字(参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此外,20世纪初期,英国有所谓“泛埃及主义”学说,以为古埃及是上古唯一的高级文明,当时世界上凡与埃及类似的文化或制度现象,都是埃及文化传播的结果(参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39页;[苏]托卡列夫

《外国民族学史》,汤正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71页)。由这一学术史背景来看,宋育仁式的想当然也就毫不足奇了。

关于此,还有一篇冷僻文献值得专门讨论:杨荫杭《埃及文与华文同源说》。仅节录如下:

中华记载言埃及之事绝少。段成式《酉阳杂俎》始言勿斯离国之大石榴,勿斯离即埃及。古者波斯人名埃及曰Meudraya,希伯来人名埃及曰Meizraim,西利亚人名埃及曰Meezraye,皆此字也。赵汝适《诸蕃志》始言勿斯离之江水,即指尼罗河;又言勿斯离属国遏根陀有大塔,即指金字塔。陶宗仪《辍耕录》始言木乃伊,即指埃及之孟密Meummy。凡此记载,皆出后世。若埃及上古之文明,则为中华旧史所未言。此虽由于道里隔绝,实因埃及建国,更古于中华,故如参商不相值也。然考埃及之文字,与中华六书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实由形声参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与《周官》保氏旧法,若合符节。则知上古之世,中华与埃及必有交关之处,不能以其地远而疑之;犹之古世印度亦与欧洲远隔,然今世博学言者,考知梵文与拉丁、希腊文有极相类似之点,皆属亚利安文,其例

同也。……六书所谓形声,实居华文之多数。乃求之埃及文字,亦半形半声;且求诸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声。今世学者,皆以楔形文字为出于埃及,然则中华文字与埃及、巴比伦皆同一系统,无可疑也。……然中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则皆流行历数千年之久,其书汗牛充栋,无不达之意,不能与最初之象形一例视之。(钱基博编《国学文选类纂》甲集,民国15年编定,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此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按:杨绛编《老圃遗文辑》《杨荫杭集》未收录此文)

仅从题目来看,相信这必是中国人关于埃及文字与汉字同源问题最专门的探索了。作者明确认定汉字与埃及、巴比伦文字同源,这类说法早为中外学界否定,可不必论(参[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7页);但他的探讨尚有条理。同时,他对埃及文字、汉字性质的局部观察,即“六书所谓形声,实居华文之多数。乃求之埃及文字,亦半形半声;且求诸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声……不能与最初之象形一例视之”,我以为仍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点,王襄《题埃及石刻拓》也有言:

埃及古文直行横行,左读右读,均无定一。画像为一字母,字母之用,大别有二:一表音,一表谊。合诸字母为一组,以成音,以其中之一字母为谊,若中国形声字然。……(《簠室题跋》第四册,《王襄著作选集》下册,第1887-1888页)也跟杨荫杭的看法相仿佛。

照一般印象,不少人仍将埃及古文字视为“象形文字”,实属错误。按现代语文学的观点,无论埃及文字抑或汉字,虽保留了象形符号的成分,但实质上都属于以“表意”和“表音”相兼的文字体系,专家称之为“表词-意音文字”(参王元鹿《比较文字学》第二章);以“象形文字”称之,未免望形生义,有点想当然(参王海利《法老与学者》,第83-85页)。事实上,任何一种能自如地表达语言的文字体系,都必然以形声字为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杨荫杭对埃及、中国文字性质的看法,实近于主流学术观点。则这一篇《埃及文与华文同源说》仍不无学术价值,在中国的文字学史和埃及学史上,尚应有一个小小的位置。